

姜革文◎著

商人·商业·唐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姜革文◎著

商人·商业·唐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商人·商业·唐诗 / 姜革文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11

ISBN 978 - 7 - 309 - 05581 - 8

I. 商… II. 姜… III. ①唐诗-文学研究②商人-研究-中国-古代 IV. I207. 22 F729.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93251 号

商人·商业·唐诗

姜革文 著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00562(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孙 晶
总 编 辑 高若海
出 品 人 贺圣遂

印 刷 句容市排印厂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11.125
字 数 260 千
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3100

书 号 ISBN 978 - 7 - 309 - 05581 - 8 / I · 387
定 价 3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 容 提 要

本书对唐诗中关涉商人和商业的篇什作了系统的整理和分析，力图通过唐诗探求当时真实的商业状况，探求当时商人的生存状态，肯定商人在诗歌传播等方面的贡献。同时，发掘唐诗对于商业的能动作用。

本书借鉴了历史学、商业经济学、广告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整个研究有散有收，以唐诗为落脚点，以唐代商人为重点，对唐代的商人、商业、诗歌进行了多角度的观照。

本书题材新颖，史料丰富，可供广大文史研究者和爱好者参考。

前 言

一、选题的意义

“商人·商业·唐诗”是一个开放性的论题。就题目本身，笔者认为有这样几种研究的方式。

其一是以唐诗作为史料，研究唐代的商业和商人。著名学者傅衣凌先生说：“我一向以为史学研究是各种知识的总和，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是有一定道理的。”^①对于唐诗的分析和了解，其实是建立在对整个唐代社会背景了解的基础上的。表面上看，我们是在做商业史的研究工作，但从更长远更宏大的背景看，我们同时也是在做文学史的研究工作。只有了解唐诗中商业和商人的相关背景情况，才能够更好地把握有关商人与商业等内容的诗歌的本质。

唐诗作为研究商人和商业的史料，实际上是属于梁启超先生所谓的“消极史料”。

尤有一种消极性质的史料，亦甚为重要。某时代有某

^① 傅衣凌《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第43页，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种现象,谓之积极史料;某时代无某种现象,谓之消极史料。试举其例子:(甲)吾侪读《战国策》,读《孟子》,见屡屡有黄金若干镒等文,知其时确已用金属为货币。但字书中关于财货之字,皆从贝不从金。可见古代交易媒介物,乃用贝而非用金……往往含有历史上极重大之意义,倘忽而不省,则史之真态未可云备也。^①

所谓消极史料,其实就是需要进行分析 and 综合才能够得出结论的史料,是具有隐蔽性质的史料。用消极史料研究课题有时能够获得用积极史料所无法获得的成果。商业在唐代属于末业,商人在唐代属于贱类,李天石先生认为:“相对而言,正史中有关良贱身份制的史料与其他方面的史料相比,数量并不很多。这是因为,正史的作者受封建史观的影响,所撰正史记传主要是为帝王及达官贵人等而设立,真正反映社会民众特别是下层民众的史料极少。”^②同理,正史关于商业和商人的研究材料也是十分有限的。本文研究唐代商人对于唐诗的传播,就主要依赖唐诗中关于商业和商人的“消极的史料”。正史中没有提到商人对于唐诗的传播作用,唐代诗人在诗歌中也没有正面提到商人对于诗歌的传播。唐代商人对于诗歌的传播作用正是通过对唐诗的深入分析而钩稽出来的。

其次,笔者试图以唐诗为例设立唐代商业文学的研究范围。本文将商业划分为商业硬件和商业软件。商业硬件主要有:商品、商店、市场、商业资金、商业资产等;商业的软件主要有:商业

① 梁启超《史料的蒐集与鉴别》,《中国历史研究法》第65—66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② 李天石《中国中古良贱身份制度研究》第17—18页,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经营者、商业劳动者、商业信誉、商业环境、商业政策、商业伦理、商业思想等。此前有学者在对唐诗中的商人形象进行研究时,就采用了三十余首唐诗作为史料。^①而笔者发现,现存唐诗中,涉及唐代商人的作品还不止这个数字(详见本文附录)。更有相当数量的作品涉及商业的硬件和软件。比如:唐诗中的商业店铺和商业市场、唐诗中的商业思想、唐诗中所呈现的城乡状况,等等。对它们的研究,值得拓展。这对唐诗研究、唐史研究的深入,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再次,商人、商业、文学的互动研究,不是三者的简单叠加,而是在三者之间有选择有侧重的组合、交叉研究,是整体的研究。商人、商业、文学的联动,使笔者所做的工作不单纯是商业史研究,也不单纯是文学史研究。这种联动研究的目标,并非仅仅在商人、商业、文学三者之间寻找一个交汇点,而是想克服商业史和文学史在试图分析和解决问题时各自的局限和盲点,使我们的思维由一元思维、双向思维模式向多元思维、立体思维模式转变,从而使文学不再局限于文学,商业不再局限于商业,使我们在理解唐代商业和商人的基础上去认识当时的文学生态,更加深刻地了解当时文学生态的各个方面。

当今世界已进入信息化时代。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不同学科在碰撞、交流、融合。在这样的格局中,文学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边界逐渐模糊。互相渗透、融合使许多新兴学科应运而生。钟敬文先生认为:文学不仅应该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也应该从心理学、民俗学、民族学和地理学等多种角度来研究。^②钱钟书先生云:

① 邵毅平《唐五代文学对于商人的表现》,《中国文学中的商人世界》第97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② 张利群主编《文学批评原理》第7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在人文科学里,至少在文学里,新理论新作品的产生,并不意味着旧理论旧作品的死亡和抛弃。有了杜甫,并不意味着屈原的过时……在文学研究方法上也是这样,法国的“新批评派(Nouvelle Critique)”并不能淘汰美国的“新批评派(New Criticism)”……有价值有用的流派完全可以同时共存,和平竞赛……①

童庆炳先生认为:

从人类学的观念看,文学是人的活动;从哲学的观念看,文学是人的一种反映活动;从现代经济学观念看,文学是一种艺术生产活动;从美学的观点看,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从媒介和符号的观念看,文学是一种交往对话。②

笔者非常理解和赞同前辈们的上述主张。在本文中,笔者第一步试图超越从文学角度研究文学、从商业角度研究商业的传统做法;第二步试图超越用某一门具体学科去观照另外一门具体学科的时兴做法,力求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将商人、商业、唐诗视为一个互动的整体——这其中包括纯粹的学科研究,也包括从一门学科观照另外一门学科,同时又强调研究的整体性。

二、本选题的研究现状

(一) 以文学为史料研究唐代商业尤其是商人的成果,当以

① 钱钟书《1980年1月在日本爱知大学文学部的讲演》,见方天星主编《一寸千思:忆钱钟书先生》,第548—549页,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

② 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第22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邵毅平先生的《中国文学中的商人世界》为集大成之作。尽管邵毅平先生在《绪论》中声称“主要是指追寻一个‘母题’（在本书稿中是‘商人’的形象）在文学史上发展变化的轨迹，同时从这种发展变化的轨迹中寻找出其意义”，^①但毕竟作者研究的落脚点是商人世界，全部是以文学作为材料进行组织，所以，该书可以视为用文学典型反映和表现商人的力作。以诗歌为史料，研究唐代商业和商人的内容，还散见于张泽咸先生的《唐代工商业》^②、刘玉峰先生的《唐代工商业形态论稿》^③、郑学檬先生的《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④、张剑光先生的《唐五代江南工商业布局研究》^⑤、冷鹏飞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形态研究》^⑥等著作中。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些专著中，唐诗仅仅作作为研究的史料，诗歌之间缺少联动研究，众多的唐诗好比满天散落的星星，缺少一根红线把它们联系起来。以诗歌为史料研究商业与商人的单篇论文，有肖文范先生的《唐诗中的商人》^⑦，不过非常简略。卢华语先生《从杜甫的夔州诗看唐代夔州经济》^⑧、田芝健先生《诗中蚕桑见世情——从数首唐诗看唐代蚕桑业兴衰之因由》^⑨等则有部分内容涉及商业和商人。

（二）唐代商业和商人作为文学的内容被研究，落脚点是文

-
- ① 邵毅平《中国文学中的商人世界》第2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② 张泽咸《唐代工商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③ 刘玉峰《唐代工商业形态论稿》，齐鲁书社2002年版。
④ 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2003年版。
⑤ 张剑光《唐五代江南工商业布局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⑥ 冷鹏飞《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形态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
⑦ 肖文范《唐诗中的商人》，《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⑧ 卢华语《从杜甫的夔州诗看唐代夔州经济》，《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⑨ 田芝健《诗中蚕桑见世情——从数首唐诗看唐代蚕桑业兴衰之因由》，《江苏蚕业》1995年第2期。

学,构成古代商业文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潘沅汶、陈书良二位先生较早提出“商业文学”的概念^①,但真正沿着这个方向进行研究的学者尚未见到,不过有些学者在这方面做了局部的工作。周晓琳先生《重本抑末与批判商贾——中国古代文学商人形象研究之一》等论文,分析了古代文学作品中对商人形象进行批判的诸多因素。^②台湾萧娴慈女士《唐小说中商贾形象及塑造意涵》^③一文,以《太平广记》所收唐人小说为材料,对其中的商贾小说进行归纳分析,揭示商贾在唐代小说中的形象,归类和分析都很精到。

(三)关于“商人·商业·唐诗”的联动研究,尽管没有见到非常接近的成果,但是,有很多学者做了相关的基础工作或者某些类似的工作。

唐代文学与商业经济的互动,有些论文很值得一提。田耕宇先生认为:“商业经济类型的变化必然影响到风俗的变化,进而影响文学的变化。唐代长安的坊市贸易格局显然对俗文学的影响有限,甚至制约着俗文学的发展。”^④昌庆志先生认为:“从唐代文学反映岭南商业的总体状况来看,岭南文化在唐代有了飞跃式发展,但具体情况又是复杂的。就物质层面看,其商业文化前锋在全国已达到了最高水准,但其落后之处又处于最低水准。”^⑤前者主要说明商业经济对文学的决定作用,后者主要说明文学

① 潘沅汶、陈书良《中国商业文学发展历史初论》,《湖南商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

② 周晓琳《重本抑末与批判商贾——中国古代文学商人形象研究之一》,《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

③ 萧娴慈《唐小说中商贾形象及塑造意涵》,见孙映逵、单周尧主编《汉唐文学与文化研究》第129—164页,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

④ 田耕宇《从唐代长安坊市与北宋汴京街市看商业经济对俗文学的影响》,《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10期。

⑤ 昌庆志《从文学对商业的反映看唐代岭南文化》,《广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对商业的能动反映。赵振祥先生《论唐代商业经济对文学的影响》^①得出“由于商风的渐于文坛而给唐代文人的创作风气和文学本身带来负面影响”的结论,但笔者以为这个结论是颇值得商榷的。

关于商人与其他行业的对比研究,主要是商人与士人、商人与农民的对比研究。商人与士人的对比研究,王德明先生《中国古典文学中士与商关系透视》乃是一篇力作,他通过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令人信服的:“文学上士与商从对立到统一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历史的反映。但在这里我们还要说明的是,由于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士人因种种原因而始终是一个受人尊敬的特殊阶层,而商人多数情况下则处于受人轻视的地位……文学中的这种现象要想得到根本的改变只有依靠中国以农业为主,以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得到根本的改变。如果把眼光扩大到现当代文学,我们不难发现这种改变的曙光。”^②李菁先生则将研究的范围缩小,重点放在中唐,认为“商贾形象在唐代文人的诗文中经历了从被批判、被讥讽逐步走向获得理解和同情的转变过程,这与中唐以后社会上普遍的重商思想是大致同步的。而探讨这一问题,也是研究中晚唐文人价值观念转变的角度之一。商贾形象在中晚唐文人诗作中变迁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这一时期文人价值观念悄然转变的过程。中晚唐文人价值观念的转变,主要体现在文人本末观念的变化和逐利思想的出现”。^③研究的细化正说明研究的深入。

① 赵振祥《论唐代商业经济对文学的影响》,《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② 王德明《中国古典文学中士与商关系透视》,《社会科学家》1992年第5期。

③ 李菁《商贾形象变迁与中晚唐文人价值观念的转变》,《宁夏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唐代文学尤其是唐代诗歌中商人和农民的对比,散见于林庚先生《唐诗综论》、陈贻焮先生《唐诗论丛》等专著当中。^①对于商业从业人员与诗歌的关系,研究论文较多。比如,关于唐诗中的妓女、唐诗中的胡姬之类的研究。

唐诗和商业结合的亮点之一是长沙窑诗文。这些纯粹是为了推动销售而“生产”的诗歌,有浓厚的商业味道。蒋寅先生侧重对长沙窑诗歌中的语言问题进行探讨^②;贺晏然先生则对长沙窑诗文的情绪、主题等多方面进行了研究。^③真正把长沙窑诗歌与商业联系起来研究的是吴顺东先生,他抓住要害进行分析:“瓷器题诗虽仅为一种装饰的手段,其最终目的实在于促销……在商言商,无论感遇怀怀,言情怨别,还是谈玄说禅,都跳不出商业局部繁荣所带来的一系列变化。”^④此篇论文可以说是诗歌与商业结合研究的佳构。

此外,徐勇先生《论唐诗与唐代商业的几个问题》一文,“把唐诗作为切入点,以诗见史,具体论述了唐代商业的繁荣与商人地位的提高、商人生活的苦与乐、商人的情感生活与商妇怨以及酒商与文人诗酒风流等四个问题”。^⑤限于篇幅,论述无法深入。

三、研究的目的是研究的方法

笔者在尽量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对唐诗中关涉商业

① 林庚《唐诗综论》第145—14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陈贻焮《唐诗论丛》第333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 蒋寅《读长沙窑瓷器所题唐俗诗札记》,《咸宁师专学报》1999年第4期。

③ 贺晏然《唐长沙窑诗文初探》,《南方文物》2005年第2期。

④ 吴顺东《关于长沙窑诗文瓷的几点认识》,《湖南考古辑刊》1999年。

⑤ 徐勇《论唐诗与唐代商业的几个问题》,《湖南商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和商人的篇什做系统的整理和分析,力图通过唐诗探求当时真实的商业状况,探求当时商人的生存状态,肯定商人在诗歌传播等方面的贡献。同时,发掘唐诗对于商业的能动作用。

笔者主要采取散点透视的研究方法。唐诗对于商业和商人的呈现,作者各有不同,时代各有不同,写作的侧重点、对于商业和商人的观点和态度各有不同,这些不同决定了文章需要采取发散式的思维、散点透视的研究方法,以诗证史,以史证诗。

笔者借鉴了历史学、商业经济学、广告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整个的研究,有散有收,以唐诗为落脚点,以唐代商人为重点,对唐代的商人、商业、诗歌进行多角度的观照。

四、主要内容和结论

本书共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以前述唐诗为例构建古代商业文学。潘沅汶、陈书良二位先生首先提出“中国商业文学”的概念,笔者对他们所下的定义有所补充和订正,并且从三个角度设想“古代商业文学”研究的方式:一是以人为重点,观照古代商业文学。这里的“人”,重点是商人、商业从业人员、商人家属、诗人本身;二是从反映论的角度观照古代商业文学。反映论是最传统的文学理论,具体到唐诗对商业和商人的反映,我们需要加强对唐诗中呈现的商品、商业店铺、商业市场等商业硬件的研究,还需要加强对唐诗中呈现的商业思想、商业道德等商业软件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唐代文学所呈现的商业市场尤其是夜市和宫市,其他方面的研究尚有待于进一步开拓和深化;三是从影响论的角度观照古代商业文学。唐诗的作者多是士人,掌握着主流社会的话语权,能够影响当时的商业;唐诗本身作为宝贵的文化资源,又是后世商业发展的持

续动力。唐诗作为文化资源而成为商业发展动力的案例,不但需要而且也值得发掘。

第二部分是从唐诗呈现商人的角度,用诗史互证等方法进行散点透视研究。

相关唐诗对商业软件呈现的分析,尚待开拓。《从唐诗看唐代商人的信仰》论述了唐人比较普遍的乌鸦崇拜;唐代商人宗教性的乌鸦崇拜及其根源;唐代商人的多元信仰。《从唐诗看唐代诗人的商业思想》则试图分为三个层面进行论述:具象的、观念的、本质的。从具象的层面,诗人对于商业之偏见呈现甚多,且不利于当今之商业发展;从观念的层面,重点拎出诗歌中的“重义轻利”,着重分析了这种思想对于今天商业发展的积极作用;从本质的层面,诗人们假定农业为本、商业无利,需要我们辨析。

《唐诗中行商与坐贾》,对唐诗中的商人进行归类分析。不同的分类,是沿着不同的逻辑线索,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作品,是多角度的观照,能够立体地展现唐诗中的商人状况。本章重点论述唐诗中的行商与坐贾。本文尤其着力分析了行商的多元情感,这一领域曾被研究者所忽视。

《唐诗中商人和农民对比题材论析——以中唐为例》就三个问题展开论述:农民的逃亡和农民的经商、农民和商人的税负比、商人和农民对比诗歌的相关性分析。中唐关于商人和农民对比的诗歌,内容主要有两点:第一点,农民赋税太重,而商人的赋税相对很轻;第二点承接第一点,农民为了逃避赋税,纷纷去做商人,整个社会出现“本末倒置”的现象:经商的人多了,务农的人少了。在诗人看来,这二者之间存在一种必然的逻辑关系。后世的文学研究者基本上沿着中唐诗人的思路,对其诗歌进行忠实于原作的分析。笔者据有关史料考证,得出不同的结论:农民逃亡以后主要还是做农民;农民逃亡不是因为新的税收制度,

新的税收制度是因农民逃亡而采取的对策,不是农民逃亡的原因。中唐诗人认为商人的税负比农民轻,实际情况并非全部如此。诗人轻商实际上是诗人内心失落的一种表现,我们对唐代商人和农民对比的诗歌需要作辩证的分析。

承接商农对比话题,《诗人与商人、商业》用演进的方式,论述了诗人与商人商业的关系。诗人与商人开始是矛盾的,这种矛盾,是智慧者之间的矛盾,是有组织者之间的矛盾,是彼此的利益冲突。矛盾是不断转化的,唐代是诗人和商人关系变革的肇始。更进一步,诗人向商人和商业靠拢了。

唐代的商人是唐诗的重要传播者。然而,尚未见到有研究者正面提及唐代商人对于唐代诗歌传播所起的作用。《唐代商人对于唐诗的传播》就此课题从五个方面展开论述:其一,商人传播诗歌,是当时社会环境下效益最大化的必然选择。其二,唐代书信多有诗作。唐代商人每每兼充信使,故也是诗歌的传播者。其三,唐代商人是唐诗的重要口传者。其四,唐代商人在经营活动中传播诗歌。如将诗歌制作成图书销售,在经营场所设置题诗板,千方百计吸引诗人来消费,都主动或者被动地传播了诗歌。其五,商人利用商品传播诗歌。长沙窑诗文的出现是最好的例证。

五、创新之处

本书的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四点:

首先,历来研究唐诗中的商业和商人的学者,对于唐诗中商业和商人的研究,因为研究目标的不同而相对宏观。比如对唐代诗歌中的商人形象的研究,主要依据的唐诗约三十首左右,^①

^① 邵毅平《中国文学中的商人世界》第97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而本书则大大拓展了研究空间。

其次,唐诗中的商业思想往往积淀为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而容易被忽视。本书力图对其中的商业思想进行梳扒,去粗取精。

在研究唐诗中商人和农民对比的时候,文学研究者往往沿着诗人的思路,史学研究者往往离开了文学本身。本文通过史、诗互证等研究方法指出:唐代农民逃亡以后主要还是做农民而不是去做商人,新的税收制度是农民逃亡的结果而不是逃亡的原因,农民和商人的税负比并非一边倒地就是商人的税负轻而农民的税负重。纠正了历史上诗人的说法、后世文学研究者的说法。

其三,历来研究唐代诗歌传播的学者,主要将诗歌传播的功劳归于歌妓和诗人。本书通过详细论证指出:商人也是唐诗的重要传播者。

其四,在研究方法上,笔者采取多元的思维模式,综合观照唐代诗人、后世的文学研究者和商业史研究者的思维视角进行归纳分析。

本书的不足是显而易见的。由于笔者学养的限制,某些章节停留在浅层次的描述;文章本身的连贯和整合非常不够;散点透视的研究法如何形成统一的聚光点,需要在提高个人学养的前提下进行。还有些研究设想因为个人能力和精力等多方面的原因未能完成,有待进一步拓展、修改和完善。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绪论：唐诗中的商业文学	1
第一节 商业文学的定义	1
第二节 以“人”为重点观照古代商业文学	4
第三节 从反映论的角度观照古代商业文学	9
一、商品	11
二、商业店铺	16
三、商业市场	23
四、商人以及商业服务人员	36
第四节 从影响论的角度探讨古代商业文学	44
一、唐诗影响商业的原因	44
二、唐诗对于商业多方面的影响	49
第二章 从唐诗看唐代商人的信仰	55
第一节 唐诗体现了唐人比较普遍的乌鸦崇拜	55
第二节 唐代商人对乌鸦的宗教性崇拜及其渊源	57
一、唐代商人对乌鸦的宗教性崇拜	57
二、唐代商人对乌鸦宗教性崇拜的渊源	58